

云南大学校庆六十周年（一九三——一九八三）

史學論文集

（歷史系編）

云南大学校庆六十周年

(1923——1983)

史 学 论 文 集

云南大学历史系编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 大庆六十年 更上一层楼……………张德光 (1)

✓ 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碑有关的几个

问题……………方国瑜 林超民 (5)

✓ 古代暹罗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江应樑 (18)

再论宗教世界观与唯心主义哲学……………杜国林 (35)

风俗习惯应否列为民族构成要素?

——关于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熊锡元 (48)

试谈西双版纳傣族封建制的特点……………木 芹 (55)

读史札记二则……………徐文德 (74)

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李 埏 (81)

孔丘尚武……………马开樑 (91)

论我国农民战争与生产力的发展……………罗秉英 (95)

读《李定国纪年》……………杨寿川 (109)

唐代的贱民……………武建国 (117)

辩证方法与历史研究……………谢本书 (131)

五四前后恽代英的哲学思想及其转变……………赵春谷 (145)

云南大学创办的历史条件·····	丁宝珠 (15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	杨德慧 (168)
杜文秀与大理政权·····	吴妙玲 (177)
论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	高光汉 (186)
近现代印度种姓制的演变·····	武希轅 (204)
再论拿破仑的历史作用·····	赵瑞芳 (2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中立外交的政治 后果·····	吴继德 (233)
论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	徐康明 (248)
古代城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左文华 (267)

大庆六十年 更上一层楼

张德光

云南大学一九二二年创办，一九二三年招生，一九三七年设文史系。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如闻宥、胡小石、楚图南、徐嘉瑞、顾颉刚、白寿彝、钱穆、向达、吴晗、闻一多、刘文典、华岗、尚钺、姜亮夫、谢国桢等，曾先后在这里任教。这对于文史系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朴实学风的形成起了良好的作用。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文史分家，正式成立了历史系，先后由方国瑜教授（纳西族）、张德光教授担任系主任。在这里任教的专家有杨堃教授（已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纳忠教授（回族、已调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陈复光教授（已去世）、江应樑教授、李埏教授、张家麟教授、李德家教授、马开樑教授等。这些学者大多在国内享有一定的声望，有的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方国瑜教授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等专书出版后，国内外都有好评。西德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雅纳特给方国瑜来信中，曾称方为“纳西文化和历史研究之父”。

历史专业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历史文选、史学理论等基础课及共同政治课、外语课以外，还先后开设过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亚洲史、民族史、世界史、阿拉伯各国史六个专门化组的三十多门课程。

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来校视察时指出，云大历史系应结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因为，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国内五十六种少数民族中，云南有二十四种，几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的一半；在全省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占三分之一。为此，云大历史系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九五九年增设了民族史专业，除招收一届本科生外，还先后招收了三届研究生。一九六二年贯彻“八字方针”，因民族史专业口径较窄，毕业生分配有困难，根据上级指示撤消了这个专业，把民族史教师保留下来，于一九六三年成立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一九七九年扩大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

自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三十年间，历史系共培养了本科毕业生一千零三十四人、研究生十四人。在五十年代的毕业生中，有的已提升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并在学术上作出了某些成就。如一九五四年毕业的尤中副教授（现为云大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一九五八年毕业的邹启宇副研究员（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代理秘书长、省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杜玉亭副研究员（现为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一九五九年毕业的谢本书副教授（现为云大历史系副主任）、一九六〇年毕业的詹承绪副研究员（现为中国民族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等。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刚毕业的两届本科学生一百四十三人，学习基础扎实、成绩突出，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十四人，在省以上报刊发表论文二十四篇，译著多篇，其中有三人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论文三篇，被邀出席全国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此外尚有四位学生被邀请出席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目前，云大历史系有教师四十人，专职研究和资料人员十三人，两项合计共五十三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十四人，讲师二十人，两项共三十四人，占教学、科研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开

出全部基础课、必修课外，近年来又开出了三十多门选修课。现有在校本科生二百六十一人，研究生六人（其中博士研究生一人）。

历史系在以教学为主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近年来完成了一些科研项目，逐步形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

方国瑜教授出版了几十年来搜集、整理、研究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纳西象形符号是世界上现在仅有的活的象形文字，此书出版后，国内外学者都比较注意。方国瑜还完成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滇史论丛》、《中国西南地理考释》、《彝族史稿》等著作，主编了大型资料集《云南史料丛刊》五十辑（每辑十万字，预计编辑七十集）。方国瑜教授的助手木芹、徐文德讲师除协助方国瑜教授外，分别独立完成了《云南地方史研究讨论稿》、《南诏野史会证》、《云南志校补》、《南中志会笺》以及《清实录辑要（云南部分）》、《明实录辑要（云南部分）》。

江应樑教授已出版《百夷传校注》，完成了《佤族史长编》。尤中副教授出版了或完成了《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论集》。杜国林副教授参加《宗教辞典》、《民族工作手册》的编写。熊锡元讲师完成了《民族问题理论基础》。

张德光教授、谢本书副教授正在主编《中国古代史论选》、《中国近代史论选》。李埏教授完成了《唐宋经济史稿》、《两宋楮币史系年》。朱惠荣讲师除与尤中副教授等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外，完成了《徐霞客游记注释》。

张家麟教授完成了《阿富汗史》。武希轅副教授完成了《印度种姓制度》。赵瑞芳、吴继德讲师分别参加了高校协作教材《世界近代史》、《非洲各国史》的编写。

李为衡副教授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籍介绍》初稿。谢本书副教授完成了《蔡锷传》、《北洋军阀史》，主编了《护国运动史》。

此外，还有一部分教师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志丛书的编纂和《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

历史系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办好历史专业，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保证教学，特别是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另方面要突出重点，办出特色。这就是说，根据我们的主客观条件，计划今后若干年内在云南地方民族史、中国封建经济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方面做出更多的成绩，形成自己的特色。

今天，在纪念云南大学校庆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党的十二大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更上一层楼，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

有关的几个问题

方国瑜 林超民

大理三十七部盟誓碑又称石城会盟碑。曾没入土中，康熙十八年(1679)在曲靖城出土，先置于城北门外武侯祠，喻怀信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将碑移置至城内奎阁壁间。曲靖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长平彝谢显琳(瑯书)关心文物，为保存传扬，于1939年将此碑及爨宝子碑移至今曲靖一中内，并建碑亭妥为保护，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无撰文书丹姓名，其文朴质，书法流利。叶昌职《语石》卷二称：“精采飞动”，“虽荒裔之士，书法亦妙入能品。”此碑不仅书法有唐人遗风，且为有关大理史事的重要文物，所叙事迹不详于史籍，尤为难得。

前人多有题跋，然尚疏略，当进一步研究。

一 关于碑的著录

三十七部盟誓碑见于记载为元《混一方輿胜览·曲靖路·南宁县》：“有盟誓碑曰：‘段氏有国，与三十七部立盟誓碑。’在曲靖北五里。”当出自李京《云南志略》。正德《云南志》卷九《曲靖府古迹》说：“石城在府北二十余里，旧有一碑，乃段氏

与三十七部诸蛮立誓盟之碑”。万历《云南通志》卷三、天启《滇志》卷三并有记载，惟“石城在府北二十余里”之说误。康熙《云南通志》卷十九《古迹志》说：“石城碑，在曲靖府城北二里许，昔段氏三十七部落会盟所立。本朝康熙十八年营兵于土中掘出”。与元《混一方舆胜览》所说相近，当可确信。今碑上端嵌喻怀信题记也说：“康熙初掘土得之”。可能嘉靖、万历以后淹没土中，康熙年间重新出土。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六十首录此碑文而多误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二十九校正九字，尚不尽确。现所得抄本、照片字迹完好。碑文自左而右直行书写，惟光绪《云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三所载误为自右而左，不可卒读。

立碑的年代，碑称“明政三年岁次辛未。”按：《南诏野史》载：段素顺以开宝二年即位，改元明政，则明政三年当开宝四年（971），这一年适逢辛未，以碑证之，“野史”所说可信。《滇载记》说：“段素顺以建隆四年立。”与“野史”所记不同。《滇载记》又说：“段素顺在位十七年，其子素英以雍熙三年立。”则“建隆四年”之说误。又李京《云南志略》缺段素顺一代，可能因素顺之前段思聪在位，同为十七年，因相同传钞而误。明政三年距段思平讨杨干贞，建立大理政权已三十五年。而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五说：“段思平借兵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会于石城，与思平盟誓立碑。”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六说：“石城碑，昔段氏破杨干贞，与三十七部会盟立。”由云龙《定庵题跋》说：“段素顺追其祖迹而立碑以永之，后衔名首行三军都统下空二格，即为思平避其讳也”。但碑文说“奉睿旨统率戎行，委服皆恩，抚安边塞。”可见并非追述段思平事迹，且三军都统下空格，是因为“皇”字，空格以示尊崇，而不是避讳。这块碑与段思平毫不相关。《南诏野史》诸书都有段思平借兵三十七部的记载，而没有段素顺与三十七部会盟之事，可能就是把段素顺

的事附会到段思平身上，而造成倒误。

二 关于碑文的几个重要地名

1 三十七部

碑文说：“会集三十七部，颁赐职赏，故乃约盟誓，务存久长。”袁嘉谷说：“碑之三十七部即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南北朝时已著名。”并注明“见《北史》。”按：所说即《北史·史万岁传》出自《隋书·史万岁传》原文说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进渡西二河，入渠滥川，破其三十余部。”按：此为“三十余部”在滇西洱海区域而非爨地，与爨地乌、白蛮三十七部无涉。李家瑞亦从《滇绎》引《北史》为说，虽未把“白”、“爨”等南方之部列入三十七部，却以“松爨”为“松外蛮”，将今西昌地区的邛部、沙麻、落兰等部列入三十七部，更为错误。“松外蛮”在洱海以北，不属“东方”爨地，不能因“松”字而强作比附。三十七部在滇东的爨地，三十七部的名称当始见于此碑。这时大理政权建立已三十四年，沿袭南诏统治三十七部地区约盟授职。自此以后，三十七部作为地区名号，多见于纪录。

三十七部的境界。《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八年五月辛未，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三路。”按：三路北为武定路，南为临安路，中为路南州。此三路在大理时期为三十七部，而三十七部、又不限于元初所设三路辖境，因乌撒、乌蒙、东川、茫部不在其内。

《南诏野史·段思平传》说：“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会于石城。”《元史·兀良合台传》说：“平大理乌白蛮三十七部”。按：樊绰《云南志》卷四说：“东爨乌蛮也，西爨白

蛮也”。所谓黑爨、松爨当就是东爨、西爨。三十七部在爨地，故称爨蛮三十七部。三十七部当不限于西爨地，东爨地也应在三十七部之列。

爨地之内的部族总称爨部，各有聚落，称之为“部”。景泰《云南志》陆凉州说：“夷语以县为部。”犹三十七县，为政区称谓。各部自有名号，各有首领。碑文说：“合集三十七部，颁赐职赏。”即各部首领受大理统治者之任命，如禄劝掌鸠河摩崖说：其祖“阿而受段氏命为罗婺部长。”以部为政区名号，与一般称部落或部族不同。三十七部作为地区名号，自大理前期到大理后期一直在使用，但三百余年中，部的兴废分合当因时而有所改变与不同，未必固定为三十七部的数目，但习惯上就用三十七部总称爨地。大理后期在三十部地区分一府、四郡、一镇等政区以统摄，而以部为基层行政单位，故元初征服大理各地，仍举三十七部的名称。大理后期设部为政区，部领甸、寨，而纪录多错杂，尚难定论。其具体地理位置可参看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2 石城

碑文有石城地名，为爨部重镇。樊绰《云南志》卷四说：“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理石城”。又卷六说：“石城川，味县故地也，贞观中为郎州，开元初改为南宁州。”按：武德七年(624)置南宁州都督府，领十六州，治味县之石城。贞观八年改南宁州为郎州都督，开元五年复号南宁州都督，天宝元年依旧都督羁縻三十七州，天宝末没于南诏。《元史·地理志》曲靖路南宁县说：“唐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治石城。及阁罗凤叛，州废。蒙氏改为石城郡，至段氏、乌蛮莫弥部酋据石城。”按：南诏拓东节度所属有石城川，无设郡之说。则所谓“蒙氏为石城郡”当是在大理前期，设此郡隶善阐节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通道

外夷》说：“自杞国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境，曰善阐府。”按：已考订自杞在贵州兴义（黄草霸），则自杞与善阐中途之古城郡即石城郡。“古”为“石”字形近而误。南宋人知有石城郡，即大理后期的设置，又据此碑文，可以确定大理前期与后期并设石城郡。惟大理前期与后期之石城有所不同。大理前期设郡，为直接统治的一个据点，与部、甸同列，至大理后期以郡统辖部、甸，而不是废郡为部。则“元志”所说“至段氏乌蛮莫弥部据石城，”即莫弥部与石城郡同城，并非废石城郡设莫弥部。莫弥部酋居石城以后，仍设石城郡由段氏委官统治，而莫弥部归石城郡管辖。石城郡所统率除磨弥部外，较大的尚有落蒙、仁德、于矢等部，在此基础上元初建立曲靖路，以及仁德府，普安路、广西路。至于石城，元宪宗七年设磨弥万户府，至元十三年为南宁州，隶曲靖路，明为曲靖府治南宁县，今为曲靖县城。

唐以来曲靖府治屡有变迁。今有人以《清一统志》为本，强指石城在今曲靖城北二十余里。惟三十七部会盟碑所在为石城旧治可以确说，石城碑在曲靖府北二里许，碑亦于此时重新出土，其说不误。而正德《云南志》所说在“城北二十余里”当传钞衍“十”字。诸书不考而沿其误。今当以石城碑为据明其讹而纠其误，岂可不辩是非而盲从？

3 求州

碑文地名有求州。《南诏德化碑》记诸爨杀安宁县城使者爨部首领有求州爨守懿。《新唐书·两爨传》说：“爨蛮之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南诏碑》之求州《新唐书》之求州，应就是“石城碑”之求州，同为一地。樊绰《云南志》卷四有大览睢、小览睢。按：睢即州，为唐初览州。以“樊志”卷一路程及附录袁兹行记考究，览州应在今楚雄县境内。《元史·地理志》、景泰万

历、天启、道光诸志书并释傍、望、览、邱、求五州在楚雄府境，其说近是。《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三年说：“西南徙莫祗等蛮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邱四州。”没有提伶望蛮，适缺求州。知此四州为徙莫祗莫，而求州为伶望蛮地，即爨蛮地与四州接壤。则求州应在爨部之西境，也就是郎州、昆州之西北。傍、望、览、邱四州之东北。以今地考之，应在武定，元谋、禄劝诸县。又碑文所称代连弄、兔覆、磨乃三邑郡在求州，但不详在今何地。

4 延众镇

碑文说：“是以剪除延众镇长奇宗……统置延众镇。以二月八日回军，三月七日到石城……”“延众镇”为一重要地名。剪除延众镇长奇宗，统置延众镇为一重要史实，是碑文的主要内容。按：“延”字不见于字书。惟《说文》卷二“延、从‘廴’，厂声。”碑文偏旁从“廴”十分清晰，与“延”、“建”诸字同部。

“爪”上笔为“丅”，下笔为“止”而省，即是“延”字的行书。罗振玉《碑别字》卷二载魏《刘洛真造象记》所用“延”字为“𢇛”与石城碑“延”字相似。又载汉《孔庙碑》延字为“𢇛”、齐《赵桃□妻造象记》为“𢇛”，齐《宋敬业造象记》为“𢇛”，唐《颍丘李公夫人刘氏墓铭》为“𢇛”，唐《黄君夫人刘氏龕铭》为“𢇛”。知延字行书写法甚多，碑版别字如此，“延”字为“𢇛”字可以确定。有人以为不是汉字，是少见而多怪。

从碑文记载可知：（一）延众镇为大理之边塞，（二）属于三十七爨部，（三）距石城较远。这是大理的重要地名，为大理历史重要资料，当认真考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说：“元丰二年三月广西经略司言：延众镇右千牛卫将军张智常诱致九道白衣内附。”又卷三四五说：“元丰七年五月丁卯，以邕州延众镇为富州”。按：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张栻《静江府厅壁题名》、

《岭外代答》、《诸蕃志》诸书可确定白衣地近交趾之边外，或即近交趾边外的部族。所谓延众镇诱致九道白衣内附，就在其以南之地是很明白的。

所谓“以邕州延众镇为富州”，当即元代广南西路的富州。

《元史·地理志》广南西路宣抚司缺注。魏源《元史新编·地理志》补之说：“宋时，特磨道依智高之裔居之。至元十四年，宋知特磨道事依士贵内附，立广南西路宣抚司。”初特磨道及左、右两江三十余州县附云南，设广南西路。广南西路所领的地区“旧为特磨道，元立广南西道宣抚司，领路城、上林、罗佐、安宁、富五州。”（见《寰宇通志》卷113）又《明史·地理志》说，“广南府，元立广南西路宣抚司。”“富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属广南西路，洪武十五年因之，后俱废”。可知元之广南西路为宋时特磨道。特磨道就是今广南之东北部及富宁县地。《新唐书·南蛮传》“西原蛮”条说：“其地西接南诏。”以西原蛮地考校，其西接旧兴古郡，则特磨道之地属南诏。大理前期的延众镇即是特磨道的富州，今云南的富宁县。碑文说“以二月八日回军，三月七日到石城。”按：行军近一个月。从特磨道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墟，七程至最宁府，六程至鄯阐府，为十五日程。若到石城，则近二十日程。加上行军中的其他事务和延留，则自延众镇到石城差不多就是一个月，与碑文大体相合。延众镇为大理东南边疆要塞，以此处为重要军事据点和交通要冲。见于纪录，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通往邕州有数道，其中特磨道经延众镇，通往安南亦有数道，其中东南道经延众镇。

三 大理段氏东南部政区

碑文所述统率戍行，安抚边塞，统置延众镇。知大理段氏势力东南已达延众镇，东邻邕州，南界安南。又段氏合三十七部于

石城共约盟誓的事主要在延众镇及其以西今滇东南地区。大理在此设立政区，统率诸部。这一地区的政治设施也应详加考察。

大理东南部地区，南诏时设通海都督，为拓东节度的前哨，后为一大政区。大理前期沿袭南诏旧制，设通海都督，也称为节度。李京《云南志略》有“通海节度段思平。”《南诏野史》有八节度，通海为其中之一。其辖境当与南诏时相同，设有通海郡、建水郡、巴甸、石屏诸郡邑。大理后期随着社会发展，废通海都督，以社会经济较为发展的部、甸为基础设置秀山郡，其中阿焚部最大，所以景泰《云南志》说：“秀山郡，一名阿焚部。”而部与郡可能同在一城。秀山郡领阿焚部及思陀、落恐、溪处等部，与威远睽（今景谷）辖境相接。而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东部边境地区则别立最宁镇，以军事统治为主。

王本《南诏野史·段正严传》载：绍兴十七年丁卯“慧出，慕宁远，矣、空、破、马地方叛。二月征之，大败。”而胡本在宣和元年正月。《滇云历年传》卷五为“绍兴十七年二月。所说年代不知孰是，而所列地名疑在最宁镇地区。“慕宁”为最宁之误，方曜仙藏抄本《南诏野史》，“慕”字作“墓”。按：最字原作“蕞”，因字形相近而误作墓，又误作慕。盖蕞宁为彝语常用地名。大理后期设蕞宁镇，有省作最宁，有误作慕宁。慕宁以下则以一字当一地名。“矣”为矣尼迦，“空”为空亭，“马”为阿马，“破”为褒古。此四地名即矣尼迦、教合、褒古、王弄山四部。惟“远”字尚难解说，可能为“道”字形近之误，即最宁道，犹最宁镇。所见记录甚略，惟所谓“慕宁远、矣、空、破、马”即在最宁镇境内，作此解说，大致可通，否则就无适当地点。

大理时期通往邕州安南以最宁为重镇，特别是在段正严（和誉）时，由邕州道通宋朝，历年出战马至横山寨博易，往还频繁，并出兵与安南争夺，则其间骚扰矣、空、破、马诸部，以至引起反抗，决非偶然。

《元史·地理志》载临安路领三州四县，其外金齿百夷诸部地缺略失载，而《混一方輿胜览》所载除三州四县外有金齿百夷诸部，列举地名，在临安路东南的有：哈迷部、王弄山、教合三部，矣尼迦部、捨资部、纳楼部、铁锁甸、花角蛮，大甸、七十城门甸等处，此诸部当是段氏最宁镇所辖之地。以上地名方国瑜教授《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已详加考释，兹不赘。

大理后期设立最宁镇的事迹，未见明确纪录，依据片断记载，有几个问题是可以确说的：（一）周去非《岭外代答》载通道自横山寨至善阐府，以最宁镇为要站，且地名称府，是一大政区的首府；（二）《南诏野史》诸书（当出自《白古通》）所载，慕宁（最宁）所属有矣、空、破、马诸地，略包有清代所设的开化府境；（三）元初征服云南、兀良合台出兵交趾，驻阿迷招降王弄山、教化诸部，即因属于阿迷的附庸；（四）元初立阿迷军民万户府，维摩千户属阿迷万户，其地与广南、富州相连，距阿迷三百余里，即因与阿迷原是一个政区。其余王弄山、教化未设千户、百户，故未记载。但隶属阿迷万户则是确定的。由以上数事，可知最宁为大理段氏统治区域内一个重要的行政区，以阿迷为治所，设镇管辖大理东南的广大地区。

从“石城盟誓碑”所说延众镇地名。《南诏野史·段和誉传》载矣、空、破、马诸地名以及元《混一方輿胜览》临安道阿迷万户所属各部地名，可知大理疆域，其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的边界与汉晋时兴古郡，隋唐时南宁州、南诏时通海都督，元明时临安道东南边界相同。又据《宋史·交趾传》、《越史略》、《越史通鉴纲目》诸书所载，大理段氏与越南李氏历次争端，在今越南高平省、河江省、老街省，元时纪录在莱州省。可知大理疆域之东南边界全线在今文山、红河两州边界以外，明初尚犹如此。这是西汉以来的传统边界。而至明宣德时越南黎利、成化时黎灏、嘉靖时莫登庸，万历以后黎氏，先后侵占云南边界，得寸进尺，愈